



全球化 與 新制度主義

全球化 與 新制度主義

● 薛曉源 · 陳家剛 主編



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

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

● 薛曉源 · 陳家剛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薛曉源、陳家剛主編

—初版.—臺北市：五南，2007 [民 96]

面；公分。

I S B N: 978-957-11-4609-6 (平裝)

1.國際政治 2.國際經濟 3.國際關係

578

95024827



1PU1

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

編 者 — 薛曉源 陳家剛

校 訂 者 — 賴榮偉

發 行 人 — 楊榮川

主 編 — 劉靜芬 林振煌

責任編輯 — 胡天慈 李孟珍

封面設計 — P. Design 視覺企劃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 / 台中市區中山路 6 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 /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90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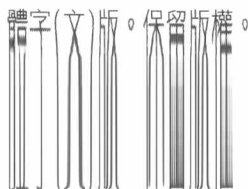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7 年 4 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 480 元

◎本版授權譯自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簡



全球化時代：我們何為（序）

壹 全球化：我們所在世界的知識語境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通訊技術和網際網路日新月異的發展，全球各民族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普遍聯繫和交往在日甚一日地加強。全球化現象於是凸顯，全球化成為最時髦的詞語，在全世界主流媒體和大多數人的嘴邊流動。

隨著全球化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快速滲透，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也呈現出來，從達沃斯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到義大利的西方八國財長會議，抗議和流血事件不斷增多，反對全球化的聲浪不斷增大增高。

有識之士不禁要問：究竟什麼是全球化？全球化究竟怎麼了？在近10年一浪高過一浪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的學術界對全球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出版了2000多種著作和30000多篇文章。其中，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頻繁亮相的知名政治家，如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撰寫的《全球化與道德重建》和德國前財政部長、前社會民主黨主席拉封丹撰寫的《不要恐懼全球化》等，他們從親身的經歷出發，詳細考究了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不管人們是歡呼還是咒罵全球化，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呈現在人們面前：全球化就在人們身邊，逐漸成為不爭的事實。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全球化已經成為了我們所處時代的知識語境，是當代知識分子認識、關心、介入現實的新工具。美國杜克大學副教授哈爾特最新撰寫的《帝國》一書，從比較歷史學、比較政治學、比較文學的融合視野出發，勾勒了從古希臘到現在全球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樣態：帝國的擴張、形式的變遷和興衰，在西方引起強烈的反響。西方媒體普遍認為，《帝國》一書的出版激發了人文學者對當代社會的現實關照和介入，為人文學者的存在價值贏得尊嚴。關於全球化問題，當前國外理論界主要有三種看法：(1)激進的全球化主張。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日本著名觀察家和評論家大前研一和英國



社會學家阿爾·布勞，他們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全球經濟的崛起、全球治理機構的出現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擴散和交融都被視為出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的證明」（《全球大變革·導論》，第6頁）；(2)溫和的全球化主張。戴維·赫爾德稱之為變革論者，他認為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的吉登斯、德國的貝克，他們認為全球化的當代模式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的國家和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過程，要努力適應這個相互聯繫更加緊密、但是非常不確定的世界；(3)懷疑論者的批評。以赫斯特、湯普森為代表人物，他們認為全球化在本質上是一個神話，掩蓋了國際經濟不斷分裂為三個主要地區集團、國家政府依然強大的現實。不管他們爭論的焦點究竟是什麼，但是他們的話語言說已經不可迴避地成為我們對全球化研究和言說的知識語境。

貳 全球化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對這個問題的掌握決定我們究竟以什麼方法和視角去研究全球化問題。英國首相布莱爾的「精神領袖」、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先生認為：全球化的本質就是流動的現代性，在這裡，流動指的是物質產品、人口、標誌、符號以及資訊的跨空間和時間的運動。全球化就是時空壓縮，全球化使得人類社會成為一個即時互動的社會；西班牙籍美國社會學教授卡斯特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中指出：「在全球經濟裡，全球能夠變成一個單位而以即時或者在選定的時間裡運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徵是不斷擴張，總是嘗試克服時空的限制，但是只有到了20世紀末，以資訊與通訊科技提供的新基礎設施為根基，以及在政府和國際機構所執行的解除管制與專業化政策的協助下，世界經濟才真正變為全球性的。」德國教育部副部長格爾茨對全球化的過程和本質體認尤深，他認為全球化使這個社會成為突然加速的社會。

參 全球化時代，我們何為

德國大哲學家海德格爾總是喜歡吟詠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著名詩句：在這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為？我們是否也需要躬身反思：身逢資訊爆炸、知識快速嬗變的全球化時代，作為知識界的代表——知識分子應該何為？我個人認為應該清醒地認識和掌握我們所處的時代，既不驚慌失措，也不隱逸迴避；應該直視我們時代所遭遇的挑戰，釐清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和痛苦；按照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進行不同學科的分析、綜合和研究。這就是我們組織編譯這些學術前沿報告的宗旨和目的，也是我們試圖回應「全球化時代，我們何為」的一種嘗試。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時間和我們知識範圍所限，我們這裡編選的文章只是粗略代表當代國際學術前沿的主要流派，面對浩瀚和激變的國際學術瀚海，可以說是掛一漏萬，不足之處，請方家批評指正。本叢書的編輯、出版得到了廣大作者、譯者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薛曉源 謹識

2002 年 10 月於北京新風寓所

Contents

全球化時代：我們何為（序）	v
前言：全球化時代的新制度主義	001

第一部分 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

第一章	全球經濟與地方政治：李普哈特的共識民主和包容政治	019
第二章	作為全球治理機制的規制	033
第三章	全球治理的變革：從民族國家到國際制度	047
第四章	制度主義與歐盟：超越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	055
第五章	世界社會中的區域組織：系統理論與新制度主義	065

第二部分 新制度主義：概念與理論

第六章	制度主義：新與舊	079
第七章	新制度主義的源流	099
第八章	新制度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	113
第九章	作為方法論的制度主義	127
第十章	制度分析範圍的擴展	139
第十一章	制度理論：問題與展望	155

第三部分 新制度主義的知識基礎

第十二章	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	175
第十三章	政治科學與三個新制度主義	195
第十四章	政治法學：新制度主義與公法的未來	213

第十五章	比較政治學中的歷史制度學派	229
------	---------------------	-----

第四部分 制度主義：政治、社會與經濟

第十六章	新制度主義：制度與社會秩序	247
第十七章	制度、制度的影響與制度主義	259
第十八章	作為政治產品的制度	271
第十九章	經濟學、制度和經濟發展	283
第二十章	嵌入與超越：制度、交換和社會結構	299
第二十一章	平權與領導權：等級制與社會秩序	323

第五部分 新制度主義：組織、觀念與文化

第二十二章	公共秩序與正式組織建構	347
第二十三章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	367
第二十四章	組織領域中的制度同形性與集體理性	385
第二十五章	回歸社會：符號、慣例與制度衝突	399
第二十六章	變革社會規範中的衝突：討價還價、意識 形態和執行	417
第二十七章	觀念與有限創新政治	433
第二十八章	觀念、利益與制度：歐洲貨幣合作的國內 政治	449

附錄：近年最新出版的新制度主義著作	463
-------------------------	-----

前言

全球化時代的新制度主義

陳家剛

西方社會科學領域在反思經濟學中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重新發現」了制度分析對解釋現實問題的地位和作用。科斯、德姆塞茨的產權理論，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以及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最終在經濟學研究中形成了新制度主義研究系譜。馬奇和奧爾森發表的《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一文揭開了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研究序幕。

新制度主義的復興並非制度分析的一種簡單回歸，而是制度分析的現代轉型，是制度分析的演進。隨著 20 世紀後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新制度主義分析範式表現出更多的形式，其豐富的內涵也充分地展現出來。透過描述新制度主義的起源、基本的理論內容、知識基礎以及分析範圍的拓展，我們就能夠更深刻地認識新制度主義，並客觀地對它做出全面評價。

壹 新制度主義的起源

20 世紀 70、80 年代，西方社會科學領域在反思經濟學中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重新發現」了制度分析在解釋現實問題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而形成了新制度主義分析範式。

制度一直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但是，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受科學主義思潮和反理性思潮的影響，傳統政治學開始向現代政治學轉變。行為主義逐漸成為政治學的主流理論。制度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學研究視野之外。

從本質上講，行為主義政治學是對傳統政治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革新。



在研究對象上，行為主義以政治行為和行為互動代替傳統的政策和制度；在研究方法上，行為主義借助各種科學技術手段，對研究對象進行量化和實證分析。行為主義認為，個體的真正偏好只有通過一定的行為才能具體地表現出來；集體現象是個體行為的聚集，個人的偏好只有透過利益聚集機制才能帶來最佳的效果。但是，行為主義的研究同時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味地強調價值中立和研究手段的科學化，使政治科學遠離了現實政治生活；而從現實來看，主流學者無法應用行為主義的方法來解釋世界複雜的變化，他們對 60、70 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和越南戰爭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現象無能為力。這就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政治理論家的反思和批判。1984 年，馬奇和奧爾森發表了《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一文，他們指出，由於行為主義的影響，作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組織被忽略了，而實際上，組織和法律制度則是政治生活的主導者。個體「表現出來的」偏好與真正的偏好是存在距離的，集體決策不是個體偏好聚集的結果，而是決策規則影響的產物，而且集體決策無法還原為個體偏好。他們提出用「新制度主義」觀點來看待政治生活，重新復興制度分析的作用。

在政治學領域中，新制度主義的興起與對行為主義理論的批判是分不開的。新制度主義者認為放棄對制度的研究是行為主義的一個主要缺陷。「新制度主義強烈反對把行為確定為政治分析的基礎要素；他們不相信行為能夠為解釋『所有政府現象』提供足夠的基礎。因為，行為發生在制度環境中，因此，在理解這一概念時，必須考慮制度因素。」¹

而在經濟學領域中，主導二戰後西方國家經濟實踐的主流思潮是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它們使西方國家經歷了戰後長時期的經濟繁榮。

1 Ellen M Immergu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Stoneham; Volume 26, Mar, 1998.

但是，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西方各國紛紛陷入「滯脹」的困境，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經濟停滯，失業問題困擾著各國的決策者。這種狀況引起了人們對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的反思，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宏觀問題，政府作用、政府職能問題等進入了經濟學領域。在這樣背景下，一批主流經濟學家開始深入研究制度、制度變遷及後果、國家和意識形態等，並得出了富有啟發性的結論。例如加爾布雷斯的「制度演進」、諾斯的「制度變遷」和科斯的「產權理論」等。從經濟學視角對制度進行研究，開拓了經濟學的研究新視野，經濟學領域的新制度主義研究逐漸興起了。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自建立之日起，就與社會制度的研究和制度變革的比較分析密切相關。社會學者一直認為制度影響著社會和經濟行為。然而，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力圖解釋制度而不是簡單地假定制度存在。正如維克多·尼所說：「事實上，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代表了現代實證社會學的主流。這一遺產是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所尋找的基礎。」²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研究路向可能被認為是社會學向新古典主義的轉向。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擴展了古典主義社會學者和早期的社會學制度主義學者的知識遺產，後者同樣與經濟學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知識交流。

貳 新制度主義的知識基礎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新制度主義分析範式已經變成超越單一學科，遍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分析路徑。豪爾和泰勒認為，在政治科學中就至少有三種不同的新制度主義，即「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³美國學者彼特斯也概括出了新制

2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Peter A. Hall,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6), XLIV, pp.936~957.



度主義分析範式的各種流派：規範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經驗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利益代表制度主義和國際制度主義。⁴ 這些不同學科、不同流派的制度研究共同建構了新制度主義的理論體系。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社會學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和規範制度主義。

一、社會學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主義傾向於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界定制度，制度不僅包括正式規則、程序和規範，而且還包括為人的行動提供「意義框架」的象徵系統、認知模式和道德典範。這種界定打破了制度與文化概念之間的界限。傾向於將文化本身也界定為制度。

社會學制度主義解釋的重點是為什麼組織採取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徵符號，這些又是如何在組織內傳播的。即：(1)「組織的生態，以及把組織的生物生態模式結合在一起」。環境為組織生存提供機會並維持許多結構，如公共部門的地位可能是預算資源、法律命令、制度的政治支持和群眾的政治支持形構的；(2)對組織符號和價值向度的關注超越了組織的純功利性視角。組織符號成為認識制度行為的最佳手段。「制度是一種意義系統，制度內的組織行為及個體行為依賴於意義的注入和符號的運用。」；(3)人類生活的當前實踐是建立在過去基礎之上的，組織實踐下面隱藏著歷史遺留下的價值和理解力，反映了「制度的歷史和積累性本質。這些結構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但是，它們也保留了過去歷史的特徵。」；(4)社會學制度主義是用制度透視組織，制度和組織實際上是同一個結構。⁵

4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Wellington House, 1999.

5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Wellington House, 1999.

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影響行為的方式是透過提供行為所必不可少的認知模範、範疇和模式，影響個體的基本偏好和對自我身分的認同。個體與制度之間的相互關係建立在某種「實踐理性」的基礎之上，個體或組織尋求以一種具有社會適應性的方式來界定並表達他們的身分。

二、歷史制度主義

歷史制度主義強調制度運作和產生過程中權力的非對稱性、制度發展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和政治結果的多元動因。歷史制度主義是「歷史的」，歷史是克服人類理性局限性的一個主要途徑；同時又是「制度的」，它注重以制度為核心來考察歷史，以國家、政治制度為中心來分析歷史。

歷史制度主義力圖尋求對不同國家的差異性政治後果做出更好的解釋。歷史制度主義認為，政治結果的差異源自政治制度的多樣性和政治變量之間的結構性關係。例如 70 年代石油危機期間各國的政策差異以及歐洲各國醫療保健政策的差異等主要是由於一套政治制度的、政策制訂機構的聯結方式。⁶某種政治結果的出現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存在著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制度因素是推動歷史沿著某一路徑發展的相對穩定和最為核心的因素之一。「歷史制度主義雖然關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很少有歷史制度主義者認為制度是產生某一政治後果的唯一因素。他們尤其傾向於將制度與其他因素一道定位於因果鏈之中，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和觀念的分布狀況也是他們重點考慮的因素。」⁷

歷史制度主義的歷史觀強調過去對現在的影響，即前一階段的政策選擇往往會決定和影響著後一階段的政策方案。政治制度的變遷和鞏固存在著「路徑依賴」，歷史制度主義致力於在發掘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對人類產

6 Peter J. Katzenste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298.

7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6), XLVI.



生相當影響的政治進程如國家與社會革命、國家建設、民主化等問題時，不僅要找出那些共時性的結構因果關係，而且還要從事件變遷的歷時性模式中發掘出因果關係。

三、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這種分析路徑起源於對美國國會制度的研究，關注國會的規則如何影響立法者的行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首先堅持把「理性的個人」作為理論分析的起點，其次，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認為要對政治現象提供充分的解釋，就必須對制度進行分析，因為所有的政治行為都發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在方法論上是個人主義的。它以個人作為基本的分析單元，把制度安排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量來解釋和預測個人行為及其導致的集合結果；個體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偏好是外生於制度的；個體的行為以計算「回報」為基礎；制度的功能在於增進個體的效用，因此，人們通過對制度的重新設計實現制度的變化。

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看來，制度就是某種規則，該規則界定、約束了政治行為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時採用的策略；遵守制度不是道德、義務使然，而是經過計算被認為符合自身的利益，即「結果性邏輯」；制度是可以設計的，其結果主要取決於所設計制度內含的激勵與約束。在個人與制度之間，一方面，制度通過塑造人的行為影響政策結果，制度構成了個人的「策略背景」；另一方面，個人也塑造了制度，制度是基於個人的需要才被創造出來的，即個體通過制度的創新提高收益水準。「考慮到行為者是理性的，因此一旦對制度產生了某種邏輯上的需要，它就會被創造出來。」⁸

⁸ James G. March,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四、規範制度主義

規範制度主義認為，人們的行為不是以計算回報為基礎，而是以確認「什麼是恰當的行為」為基礎的，人們的行為是一種規範驅使的行為，即人們的行為遵循「恰當性邏輯」。⁹制度是政治的基本特徵，制度分析賦予政治制度更為獨立的角色。制度代表了制度化的價值，制度的變化來源於「價值的衝突」。¹⁰當規則所反映的價值與社會產生矛盾和衝突時，制度就會通過學習和適應逐漸調整。制度的變化是學習、適應和演進的結果。宏觀的政策結果無法通過個體行為的還原來解釋，個體行為只有納入到組織、制度中才能得以解釋。

新制度主義代表一種經驗研究方法，它像關注個體行為一樣關注社會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礎，強調制度因素的解釋性權力。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承襲其學科傳統，關心個體在面臨集體行動時如何進行選擇的問題；社會學新制度主義傾向於論述制度無所不在的特質；歷史制度主義則以政治學中權力與國家等傳統論題作為其重新詮釋的基礎。各個學科的新制度主義以及新制度主義的各個流派在應用制度因素分析社會現實的過程中有著共同的興趣。

新制度主義的理論內容

一、制度：從規則到觀念、資本與規制

制度是新制度主義的核心概念，也是制度分析方法的理論基石和邏輯起點。制度（institution）的中心含義是從拉丁語動詞 *instituere*（創立或建立）派生而來的，它表明一種已確定的活動形式，或者結構的結合。例如，

9 James G. March,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10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Wellington House, 1999, p.134.



政府就是制度化了的政治。傳統的制度分析主要集中於政黨、議會和法庭制度等，主要關注正式的制度。20 世紀後期，新制度主義的制度內涵開始從規則轉向了觀念、資本與規制。

在新制度主義的理論框架中，對制度的最初理解是將其看成一系列的規則、組織和規範等。「制度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範，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¹¹「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係。」¹²這種制度定義強調的是一種關係，是一種約束。約束婚姻的規則、政治權力配置規則、資源與收入的分配規則，貨幣、公司、合作社、遺產法和學校等都是制度。作為一種規則，制度通常被用於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係。當制度是一種或者一套行為規則時，這種規則就有正式與非正式之分。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業、工會、醫院、大學、政府、貨幣、期貨市場等等。相反，價值、意識形態和習慣等就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例子。¹²

制度還體現為某種結構性的安排，如組織。在政治生活中，主導著人們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就是組織，「現代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是各種正式的組織，法律制度和官僚機構是當代生活的支配性角色。」¹³國家、政黨、議會和官僚機構等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制度安排，政治制度、政治組織在塑造個人行為動機和偏好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隨著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複雜性的增強，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相互滲透的密切，制度的內涵也開始逐漸擴展開來。首先，觀念變成了制

11 道格拉斯·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第 225～226 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2 科斯、諾斯、阿爾欽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 377～378 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3 James G. March,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1984.

度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影響政策發展和制度選擇的決定性變量，觀念分析逐漸變成了制度發展經驗性工作的重要成分。觀念是「政治合作的資源、政策行為合法化的手段、政策選擇結構的認可框架、政策工具和制度變遷的催化劑」。¹⁴ 在墨西哥，「輸入的」和國內的合法性觀念對民主化過程中政治制度化、公共行政、民主化、技術官僚政治化、市場取向的改革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社會學制度主義中，制度不僅包括正式的規則、程序或規範，而且還包括符號系統、認知規定和道德典範。它們把組織和文化兩者間的分裂融合起來，把文化理解成為組織所擁有的一種共同價值觀和態度，理解成為慣例、符號或認知的網絡，為行動提供典範，提供一個「意義框架」來指導人類的行為。文化也是一種制度。¹⁵

同時，制度還表現為一種資本形式。作為具備約束性的規範，制度減少了人類行為的不確定性，規範體現了一個密切聯繫的群體或共同體中成員的興趣和偏好。規範作為資本，支持著人與人之間的信用和信任；一種基礎良好的信仰，不會總讓你在支持私人的短期收益中受損失。遵守社會群體的規範就是使規範成為一種資本形式。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制度在全球治理的層次上表現為一種新的形式：規制。規制是指覆蓋不同領域並具有不同程度效力的協定，是一系列明確或隱含的原則、模式、規則與決策程序，行為者的期望因此而在特定領域內融合在一起。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全球規制處於核心地位，它是人類共同遵守、對全球公民都具有約束力的普遍規範。正是由於國際規制的存在，

14 Klaus H Goetz, George Philip, Transferring "Good Governance" to Emerging Democracies: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31 August~3 September 2000.

15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6), XLVI.